

南昌隨侍 蔣公記

鄧文儀

本年五月號中外雜誌所載拙著我與同志好友戴笠，文中憶述筆者奉派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侍從總統 蔣公担任剿總第三科工作的的經過。謬蒙讀者好評，承編者懇邀續寫回憶文稿。今逢總統蔣公九十誕辰謹續撰南昌隨侍 蔣公記，敬請讀者指教。

——筆者

力行社同心同德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調查課的組織，比武漢剿匪總部第三科的組織，規模大些，除了集中全國情報，經過審查，分別編輯，報請 蔣委員長核閱及有關高級長官參考之外，還負擔了贛湘粵閩浙蘇各省保安機構情報單位的佈建和指揮。加上社會調查、人事調查與文化運動、新生活運動等的發起及促進；藉使民族復興運動，能在反共剿匪中心的南昌，除了軍事作戰之外，更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配合適應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剿匪政策，使南昌成爲一個戰時革命運動中心，集中三民主義力行社的幹部，在這裏切實努力革命戰鬥及實踐力行主義的建設工作。爲了要擔任這樣艱鉅繁重的工作，人事經費都極缺乏，活動方式又須保守秘密，困難是很多的。除開政策及重要運動與作法，須要行營秘書長及參謀長指導設計委員會負責之外，一切活動和行動的工作，就都要調查課擔負了。

調查課的編制組織很小，能容納的人才不多

，當時調查課的副課長是李厚微，秘書爲張毅夫，人事調查室主任黃炳陽，調查股股長謝少珊（後改名謝力公，留學俄國，係曾任共黨青年團中央書記反正自新者），軍事股股長李果謨（曾任共僑賀龍之參謀長），社會股股長李廣恕，督察兼司法股長徐業道。我選任幹部的標準以人才爲主，不計地域及學歷資歷，對共匪自新幹部人才也予以重任。康澤同志曾譏評我用的幹部，都是破銅爛鐵，因爲我保舉他任別動總隊長兼星子特別訓練班主任，我又保介了兩位曾任軍師長的公秉藩及張與仁作他的副主任，他很不滿意，認爲我管制他的人事。其實我是保荐人才，因爲他未帶過兵，必須有經驗閱歷之幹部輔佐他，他誤會了。我曾寫一長信向他說明，這是切實支持的好意，並說明人才選拔應注重品德、才幹、資歷，但當此戰亂之際，才幹與資歷比較重要，破銅爛鐵如果能好好磨練任使，即可成爲精鋼精鋼，他以後也同意我的見解。我常以此與戴笠（雨農）同志交換意見，他頗有同感。兩年後，我將第三科及調查課的工作移交給戴笠負責時，委員長 蔣公批

示「鄧雪冰所用的人，一律都要留任，不許輕易更換。」戴笠同志也很高興。後來科、課的重要幹部工作都很努力，分別負擔了很重要的方面責任，立了不少功勞，這證明當年我們所用的人，多是人才，并非庸碌之輩或是無能私人，我感到很欣慰。

南昌行營調查課的工作，都是力行社領導的革命事業，也是與戴笠同志分工合作，後來全由戴笠接辦的工作，他對於第三科及調查課的工作，常認爲是他自己的工作，當時雖由筆者本人負責主辦，但以團體組織體系言，這些工作都要受特務處的指導，密切連繫與配合。

民國二十一年的下半年，由於 蔣總司令的英明果斷，三軍將士奮勇應命，力行社、中華復興社革命青年無名英雄的埋頭苦幹，不到半年，就把豫鄂皖三省囂張的共產黨肅清了，祇有一小部份由徐向前率領，逃到川陝邊境竄擾，在豫鄂皖的殘匪則轉入地下活動。

南昌行營擴大組織



國民二十三年革命領袖蔣公(中)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高級官員合影。
右起第三人為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左起第三人為行營參謀長兼江西省主席熊式輝。

二十二年初春，江西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等為挽救豫鄂皖三省的失敗，發動共產黨擴大暴動及游擊叛亂。因為日本軍閥當時又在北方擴大侵略，發動長城一帶的戰爭，國民革命軍不能不將主力部隊一部調往河北對日抗戰，江西方面的國軍力量頓形薄弱，士氣亦欠振奮，共匪遂乘機襲擊。先有十八師張輝瓚部全師覆沒，繼有十八軍、五十二軍的失敗，局勢險惡，軍心動搖。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在保定設立行營，督導抗日戰爭，這時也不能不趕到江西指揮剿匪，因應客觀需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從此擴大，以熊式輝為參謀長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楊永泰為秘書長兼秘書處長，參謀秘書、總務各處組織，都相當龐大，權責集中，工作效率甚高，很快就顯出一種復興氣象。

我這時的本職仍是委員長侍從秘書，因為我在武漢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處第三科科长任內，曾得到若干工作經驗，也學了些振奮人心，鼓舞士氣，號召青年，協和民衆，轉移社會風氣，整飭軍紀綱的方法，所以在南昌行營改組之始，即決定在行營秘書處設一個調查課，類似在武漢三省總部的第三科，而為其工作的擴大與延續，我奉命兼任調查課長，委員長給予相當權責，及較多的幹部人員經費。更在剿匪區域各省政府的保安處內增設同性質的一科或一股，為調查課直接監督指揮的組織，儼然一個略具規模的情報體系。主要的任務正是協調中央黨部由徐恩曾主持的中央調查統計局及軍委會由戴笠領導的調查統計局，匯集他們的情報，再加研判整理，以供統帥及幕僚長的參考，實為委員長長的三級幕僚機構；不過工作的繁重與艱難，却一天天增加，我每天必須以三分之一的時間去課中工作。

行營設計委員會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爲了集中人才，研究清剿共匪及匪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有關問題的政策和計劃，成立一個設計委員會，聘任了幾十位有經驗學識的專家學者及國外回來的留學生爲委員，由秘書長主持會務，我奉命兼任這個會的秘書，調查課事實上作了該會的幕僚單位。

各委員多數是專任，各研究或審查一兩項專題，每半月舉行委員會會議一次，討論委員長交下來的專題或專案，並交換時局意見，彼此都坦率的提出切中時弊解決問題的意見。委員長間或出席會議或找幾位委員去分別談話，當時的委員中有徐慶譽、王若庸、劉伯川、張彝鼎、吳壽彭、李毓九、高傳珠、李煥之等。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保甲制度、碉堡政策等，都是設計委員會研究出來的重要內容而付諸實施收到效果

的。我負責連繫各位委員及擔任會議記錄整理分發等工作，這是江西反共剿匪復興建設的一個政經文教社會政策制度，研究、檢討、設計、建議的組織；行政事務工作雖不甚多，但對當時反共抗日有關的思想、學術的研究發展，却十分重要，我在這中間曾提供各種資料及若干意見，這是一項很艱難又很重要的工作，最難的乃是研究設計出來的結果要負責去督促實施，比如新生活運動及中國文化運動，社會調查及人事調查等工作實踐的重要責任，都要我負擔一部份，如是工作的性質與範圍逐漸改變或擴大，既要注意前方，又要注意後方，既要聯繫中、上層，又要聯繫下層，既要做幕僚業務，又要做指揮行動工作。有一個短時期，我兼任了十一項工作，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學識經驗俱嫌不足，要担負這樣複雜及繁多的職務，真是很不容易。

在南昌的閩變份子

民國二十二年冬季，福建十九路軍以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為首，醞釀叛變，勾結共產黨，反對中央政府，阻礙江西剿匪工作，在福建籌組人民政府。以社會民主黨主義及組織在各地大事活動。國民黨中央對他們的異動有不同的兩派意見：一派主張政治協商，一派主張軍事討伐。在這議論未定之際，他們在後方特別是南昌行營及江西省政府，運用一切人事關係，進行滲透顛覆活動，南昌社會方面，謠言很多，論調紛歧。南昌行營對福建事變的決定和動向，他們都能迅速知道，他們陰謀在南昌製造事端，發起叛亂。

這時行營調查課負有聯繫軍憲、安定後方的責任，根據平時的調查及多方情報研判的結果，知道福建人民政府的事變快要發生。

那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作的一大政治陰謀，共產黨為要減輕江西圍剿的壓迫，尋覓與蘇俄連絡的海口，對福建十九路軍及社會民主黨人民政府的反抗中央政府計劃是主謀及策動者，他們想利用國民黨內部及國民黨與社會民主黨的矛盾，特別是十九路軍的叛變加上南昌後方的變亂，這都是共產黨政治鬥爭的最高手段。事實上在南昌，不論行營、省府及各機關學校團體，都有不少社會民主黨人滲透和活動，甚至行營參謀長秘書長的幕僚人員都有他們的份子，這是一個十分危險與困難的局勢。

調查課同仁經過很多次的密商，中華復興社及戴雨農特務處在南昌的組織，更供給了不少的情報資料，我們發現南昌有三百多人與福建方面有關，是社會民主黨比較重要的份子，這些人的言論行動都曾經過秘密情報工作人員與復興社人員的調查覆查及監視注意，認為如果中央或委員長決定要對福建事變採取軍事行動解決的方法，南昌後方的心腹之患，即社會民主黨的滲透顛覆組織與人員，必須事先採取有效行動，方可消弭後方變亂於無形，便利前方的軍事行動及不給共產黨以製造矛盾利用矛盾的機會。我對於這些情況與意見，曾經一個月的深思熟慮，研判要用什麼方法和技能方可解決這個大問題，終於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要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祕密行動。

在行動之前，我曾將多種情況簡單分析，並

將與福建及社會民主黨有關係的比較重要的人員一百多人的名冊及記錄，提出向委員長報告請示。委員長最初的指示說：將名冊送交熊參謀長兼省政府主席負責處理，因為其中有一大部份人是省政府所屬機關學校的職員或教員，但參謀長沒重視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或者是處置有困難，有顧慮，經過一個多星期仍舊沒有下文。於是我又舊案重提向委員長請示，要由調查課協同在南昌的憲兵營及復興社與特務處工作站的同志採取行動，祇要把所有重要的社會民主黨份子，加以逮捕訊問，予以警告處分，許其自首自新就夠了。委員長默許我們的工作，但囑咐不要輕易傷害人及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糾紛。這樣我們就和上述有關的幾位負責人，詳商行動的細節及行動以後的對策，準備立刻行動。

一場捉放消弭禍源

在九月中旬的一個週末的夜晚，我們採取了行動，我和憲兵營長劉煒同志及調查課與復興社南昌市的負責人，根據事前三日來的佈置及引導認識及執行逮捕人員分組，決定在午夜過後行動。經過一番聯繫與審查，在晚上兩點鐘開始行動。沒有驚動警察機關，但有少數警察因係復興社的同志參加了行動工作，不到四小時，祕密逮捕了二百多人，經兩日兩夜的審問說服，結果，絕大多數都悔悟認錯，寫了悔過書不再參加反政府的附逆謀叛工作，第三天就把他們開釋了，一場後方嚴重的暴亂，從此就消弭於無形。

事後有人挑撥是非，大造謠言，密告我們行

動不當，行營秘書長竟簽報委員長評說我們調查課的行動，無法無天，使得人人自危，要求嚴重處分我，幸蒙委員長英明，批示：「以後非有委員長手令，不準擅自捕人，否則嚴懲不貸。」這樣一場國家的危難，與個人十分冒險的行動，能够輕巧的渡過，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也是我一生最興奮欣慰的一次痛苦的經驗教訓。

共黨女匪幹的故事

臨川是江西剿匪的前線指揮中心，蔣委員長常在這裏發號施令，共產黨匪諜在附近相當活躍，他們化裝成各職業各階級的人員潛伏偵探軍情，也收買利用了不少當地的販夫走卒地痞流氓，構成了間諜網，我們的調查情報人員暗中和他們從事間諜戰，甚為激烈。共匪利用婦女兒童的技術相當週到，無孔不入，因之我軍的行動和部署，大部份都不能保守機密。由於共匪間諜多，情報靈通，而我們因為羣衆的組織不够嚴密，戰地情報工作很薄弱，軍隊作戰常常陷於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狀況，尤其是派軍深入匪區，打糊塗仗，未有不遭匪軍伏擊而致失敗的。他們對於間諜的訓練，十分嚴格，對於婦女匪諜培養和運用，更是神奇微妙，我們調查課曾處理數十個這樣的案件，其中有一個女匪諜案件，是我親自處理的，其經過情形的困難和危險，使我驚奇感嘆，四十年來猶時以爲警惕。

民國二十三年的暮春，我們在臨川前線指揮所督導第四次圍剿贛東南的共匪，戰地情報員在臨川前面崇仁縣境捕獲一個女匪諜，因爲曾經費

了很多時間及方法監視調查，發現這個女匪諜是共匪重要的幹部，她似乎是崇仁縣境共匪諜報的主要負責人，很不容易才把她逮捕，送到行營前線指揮所來，以其不僅是一個軍事間諜，關係範圍很大，所以諜報部門送交調查課訊辦運用，而首先由我親任審判。

我和我的秘書及戰地情報組長三個人，曾經運用兩個半夜的時間審訊她。這是我與共黨匪徒多年鬥爭最痛苦的一次經歷。那個女匪諜是江西寧都縣人，年齡才十八歲，讀完了中學，人長得十分漂亮，饒慧談吐，都顯出她的精明能幹，她住在崇仁縣一個親戚家裏，是一個地主的女孩，並不是無產階級或農民的子女，從表面看，她簡直一點都不像個女匪諜。

頭一天我們從晚上九點鐘起到次晨三點多，接連訊問了六個小時，有問必答，所回答的內容都很充實，言詞文雅流利，簡直像共黨一個中上級幹部，又像是擔任過共黨支部書記及宣傳的負責人，我如果不是在俄國受過共黨的教育，也主持過國軍高級政治部，幾乎都要受她宣傳辭令的影響了；很明白的，她是受過嚴格的訓練，不僅能言善道，文筆流暢，而且也有相當豐富的鬥爭經驗與充足的情報宣傳常識，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匪諜。

我問她匪區的情況，她侃侃而談，從他們主義政策與蘇維埃各級政府的組織到農工士兵的地位及生活，詳細細說了三個多小時，其間有些是宣傳，但大部分也是事實，這證明她所受的政治訓練很充分，政治常識超過一個普通大學生，我

的秘書將她的口供都記下來了。令我驚奇的是共匪訓練一個幹部，尤其是一個青年匪諜的成就，真是萬分狠毒，我們國民黨對一般青年及青年幹部的政治訓練確實不够，相形見絀，要戰勝共匪，思想武裝與政治作戰是非常重要的呢！

時間已過了午夜，我們休息了一會，繼續審問她有關匪區的地方政治、民衆組織及人民生活等情形，她也毫無保留地說了。雖然有些內容有誇張其詞的，好像向我們宣傳共匪建設的成就一樣，但說到匪區人民生活受國軍包圍封鎖，確是十分困苦，不過他們黨政軍及民衆工作的幹部都與老百姓一樣困苦，決沒有貪污舞弊的事情，幹部帶頭示範，以身作則，刻苦自勵，很得到人民的同情，所以地方政治及民衆組織都顯得很安全很嚴密，人人納入組織，步步爲營，國民黨想要進入蘇區活動，那是極不容易的。共匪長處在基層組織，靠鄉村幹部，這是他們在江西能盤據頑抗將近十年的真實基礎，我們反共剿匪之失敗，就在輕視這基層組織與幹部之上，這女匪諜的談話資料頗有參考價值，第二次的審訊到此告一段落。

第三次的審訊着重於共匪軍事設施及間諜活動的訊問，女匪諜對於共匪軍事設施的詢問都以未參加軍事工作不知情況而不同答，關於匪區的反間諜活動，認爲他們黨政軍民及情報組織非常嚴密，國民黨的情報人員不易進入，祇有在非匪區的宣傳或政治間諜戰，可以影響他們內部的鬥爭，如過去使得共黨內部分化的A B團及李立三路線、羅明路線，都有重大的影響。

至於他們在我作戰地境內的戰地情報及她所負責的崇仁縣撫州前線的諜報工作，由於有地下組織及當地青少年的諜報網，特別是婦女與兒童的運用，到處都有他們的耳目，國軍大小的行動，都可由各種各樣的情報資料集合起來分析研判，緊急情報隨時轉報上級，一般情報分日報、週報轉報，這些問題我們所提出來審問的她都盡量答覆。

第二天午夜過了之後，我和幾個同事討論，認為這個女匪幹甚不簡單，以其知識豐富及家庭地位，似乎可以爭取運用，結果決定予以優待，儘量設法爭取反正，必要時使供我們運用工作，於第三日送往南昌行營，調查課繼續審問並派專人看守，行動不予自由，但生活方面儘量使其舒

適。

我審問這女匪諜後，感慨很深。認為我們如要戰勝共匪，必須要注意下列幾點：

第一思想戰、政治戰及情報戰應列為重要的項目，這幾方面的作戰準備與條件是多方面的，必須徹底改正，方可收到效力。

第二，對於情報間諜人員的組織訓練，特別是對於青年與婦女幹部的培養必須特別加強，沒有人才沒有年青人參加反共革命工作，單憑軍事行動是不易剿滅共匪的。

第三，是黨政軍民要能合作，共匪佔領或控制地區，全部人力物力都予集中，他們的黨政軍民完全打成一片，成爲一個總體戰，我們則黨政軍民各自爲政，軍隊各自爲戰，力量分散，那是沒有不被各個擊破或被

共匪分化渙散我們反共陣容與團結力量的。

第四，是基層的組織，幹部與工作的重要，共匪用少數的鄉村幹部、民兵隊長與婦女兒童幹部，就把整個的戰爭面控制了，無論糧食、兵源、交通、通訊，都要靠基層組織健全，有基層幹部負責堅苦工作，方可對付共匪的游擊戰爭，與羣衆運動及階級鬥爭。這是我審判

女匪諜後的心得，以後曾經向中央黨政軍高級方面反應，有些地方有若干改進，可惜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未能大規模徹底實施。

那個女匪諜恃其才色兼備，不惜犧牲色相引誘看守人員，企圖逃跑，曾有兩次類似事件發生，我們嚴厲處分工作人員外，最後以其不肯反正，無法運用，結果還是因其犯間諜罪重大，依法予以處決。

全國人才調查登記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都認爲政治的好壞，最主要的是人的問題。現代民主政治，講究法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執行，監督的還是靠人，人才輩出，賢能在位，政治修明，國家才能富強。

從民國廿一年起，我參加調查工作，曾有個天真的想念，一是看到當時壞人太多，小人道長，以致弄到內憂外患國家危急存亡，假如主管全國政治領袖羣倫的人，能有十萬橫磨劍，把那些貪官污吏、漢奸匪諜、小人壞人，斬盡殺絕，自可使得國家富強，天下太平。二是對於全國人才及奇才異能之士，作一普及而長久的調查登記，將每一個人的家世、親友、出身、經歷、專長、優點及劣點，作一普查，詳細細細登記起來，我估計全國現代中上級人才，連不在其位及隱居的人在一起，也許不會超過二十萬人，作一普查及比較確實的登記。這兩大狂想，第一項目自然是作不到，第二項却可以嘗試，雖然調查的困難很多，成就亦不可期，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



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六年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在廬山 召見本文作者並賜合影留念。

考試制度沒有完善及普行考試前，如能用十年開二十年工夫，得到調查工作人員的不斷努力，與各方面相配合，也許會產生成績，可以供政府當局作選賢與能、儲才任用的參考。

我們從民國二十二年春季開始，不揣冒昧，就在南昌委員長行營調查課，開展這項工作，研究了很多方法，編製了很多表格，分別交由各地調查工作機構與人員，協同各地黨政軍民機關團體，特別是情報、警察、文化、學術機構與人員，先儘可能將各地區、各職業、各級政府、各社會團體、各大專學校以及一般有識之士，先作一次普遍基本的調查，集合各種各樣明查暗訪的資料，分門別類，編製每一個人的資料登記冊，因為我們的目的，是選賢與能，是為國家及社會人才造紀錄，不是專門尋找別人的隱私，吹毛求疵，我們不會遭人疑忌，不怕人家誤會攻擊，由一個人的身世，到他前後左右，及過去現在未來的有關資料，不厭其詳的，用直接間接或間接又間接的方法，採訪、登錄、分析、審核，證明確實之後，才予登記，先有一份基本的靜的調查登記，再不斷的増加動的調查登記，規定有關某人的特殊事件，臨時資料，固然隨時予以登記，而對每一被調查人的平常言行舉止等，每年一度加以檢查及登記，預定三年之內，完成二十萬人的初步調查登記，這是一種艱難長遠的打算，困難雖然很多，相信我們如能持之以恆，繼之以誠，日積月累，定會有成績。

調查課爲了全國人事調查登記，特別增加了編制預算，找了好幾個辦公及保管資料的房間，

定名人事調查室，由黃炳陽中校主持這項業務，最初進行很順利，各級調查機構及人員，對於這項工作都很熱心，肯負責，資料源源而來，不到一年就已完成了兩萬多個中上級人才初步的調查登記，對於已調查的每個人之賢愚不肖，及其學能、人品、個性、操守，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與分析，雖然這些資料尚不完全，須要更多時間，更多資料補充調查，但這項調查的結果，對於國家用人行政頗有幫助，比如某省市或某部門需要用新人或換舊人，除了各有關機關的負責人保舉

了名單，可參考人事調查的資料證明那個人是否勝任，可就其優點劣跡資料加以評判，同時更由人事調查資料，提供相等的同樣地位能力的人才數位，供選擇比較的參考，對於中上級人才的升遷保舉，賞罰培養，都有效用。

人事調查工作到民國廿三年夏季，又增加了員額，積累了經驗，改善了方法，特別是對剿匪地區軍政人員的調查資料，已有若干使用價值。可惜這項工作，由於調查課改組，未能繼續下去。

中外人物專輯(一)

△精選名家汪公紀、蔣君章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汪公紀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二)

△精選名家雷嘯岑、王成聖、姚蒸民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雷嘯岑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三)

△精選名家王培堯、喬家才、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王培堯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四)

△精選名家賴景瑚、喬家才、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賴景瑚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五)

△精選名家李先聞、徐志道、宋子芳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李先聞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六)

△精選胡耐安、樵夢庵、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社

胡耐安等著
定價：叁拾元